

百年前美国文学学界的易中天-于丹现象

周郁蓓

内容提要: 20世纪初,美国英语文学学界出现了一批对抗学术、专事文化普及、相仿于易中天等明星学者的通才学者。作为社会进步、学科发展的结果与标志,通才学者颇具现代和物质性的个性追求与活动方式、颇为传统和道德性的人文立场与美学选择,在协助商业集团将大众文学阅读消费化的同时,也在大众中培养了阅读意识、民族精神以及文化自信。尽管如此,通才学者仍以走向学科边缘而告终,成为大众文化与文学学科彻底疏离的促动者与见证者。但是,通才学者从学界的退却并不意味着其人文理念的真正消亡,他们与专才学者的对抗,如今仍以不同的矛盾形式存在于美国文学学界之内,存在于文学学界与大众文化之间。为此,百年前的通才现象,不仅预示着当代美国文学学界关于文学批评方法的种种矛盾与争论,也包含着当代美国文学学术的种种问题与困境。作为美国通才现象的一种异国再现,中国的易中天现象是中国人文学科部分重复了美国文学学科的问题与矛盾的见证。

关键词: 通才学者 文学学术化 专才学者

作者简介: 周郁蓓,哲学博士、厦门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美国文学以及华裔美国文学。

Title The Yi Zhongtian's and Yu Dan's in the 1900's Field of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bstract The field of English literary studies in America was marked by a growing conflict and antagonism between generalists and specialists in the 1900's. Generalists, cultural popularizers in the same way as contemporary China's Yi Zhongtian and Yu Dan, pursued an individualistic and materialistic style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ut adopted a moralistic and conservative aesthetic stand. While facilitating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act of reading, they also helped to form the public's reading habit and raise their confidence in national culture. Their eventual alienation by the academy showed themselves as witnesses and precipitators of the split between public culture and literary scholarship. But the conflicts and controversies within and outside contemporary America's profession of literary studies have also pointed to the persistence of the generalist literary and educational positions. If scholars like Yi Zhongtian and Yu Dan are duplicated versions of the 1900's American generalists, the humaniti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re repeating the problems and conflicts that have afflicted the profession of literary studies in America.

Key words generalists specializa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specialists

Author: Zhou Yubei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i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Ph. D. Her research areas ar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zhouyube@xmu.edu.cn

过去的两年,易中天、于丹等学者在电视讲坛上的相继走红,成为我国最引人关注的文化现象之一。事实上,易中天-于丹现象,既非中国特有,亦非新生事物,易中天-于丹般学者早在百年前就出现在美国的英语文学学界,被称为通才学者(generalists)。当时的美国通才学者们,与当今的易中天-于丹们一样,以普通读者为对象撰文著书、读经释典,被精专于学术的专才学者(specialists)视为异端与另类。作为美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通才学者与专才学者在英语文学学界的对弈,作为关于文学解读方法、文学言说对象等问题不同理念对峙的典型象征,一方面,折射出大众对文化的渴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文学学科的实用化和职业化,是在弱化社会服务功能、与大众逐渐疏离的思想导向下开始的,反映了文学学科的科研化和体系化,是在研究与批评、学术

与商业、学术与大众、学术与人文、科学与美学的冲突与矛盾中起步的。百年后的今天,曾为美国通才学者们所擅长的闲适随性的文学漫论,在以学术为傲的文学学界早已乏善可陈,而其喧嚣一时的文学创作,在以时尚为本的大众文化领域也早已稍纵即逝。但是,通才学者曾致力于推广的大学通识教育仍是存在于高校之内的当代事实,其所推行的消费式经典认读方式,其所促成的时尚化文学阅读意识和普及性文学阅读品位,也仍是当代阅读文化的典型存在模式。如今,只通不专的学者在学术界早已无以生存,但是,所谓的通专之争并未因此而自然消解,当今美国英语文学学界的种种困扰实为当年通专矛盾的当代变体,因此,对这一历史现象的回顾,实是对当今美国英语文学学界各种主要矛盾本源的探索与思索。百年前的美国通才现象通过易中天等学者的文化传播行

为在中国再现,说明了以这一现象为表征的美国英语文学学界的种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国际化和当代化了。认识出现在百年前的美国通才学者现象的得与失,诠释通才理念与通才活动的利与弊,对广泛吸纳西方人文学科模式、学科理论和学科思维的中国人文学界思考人文教育和人文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一、美国通才现象产生的社会语境与学科语境

20世纪初的美国,科学主义、大众主义、消费主义、工业主义、现世主义、民族主义等种种思潮,不仅推进了社会的变革,也促成了大学的转型。高校之外,职业阶级不断扩大,廉价纸皮书大量涌现,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蓬勃发展,报纸和杂志高度产业化,传媒急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的扩展、教育的普及以及信息的膨胀。这些变迁使个人对文化、信息、形象以及地位产生了愈来愈多的渴望和焦虑,与此同时,个人对文化信息、文化商品的选择也陷入困境。而高校则在由学院升级为学生人数更为庞大、专业课程更为细化、科研权重日益加大的研究型大学的同时,在以上种种思潮所引发的矛盾纷争中,不断发生着两极化变革。一方面,高校教学日趋民主化、大众化、实用化和职业化,另一方面,高校研究日趋专业化、科学化、尖端化和现代化。社会的急速变革和高校的两极发展,使刚从古典文学专制中突围而出的英语文学专业陷入困境和困扰之中。一方面,高校的科研化趋向,要求英语文学专业迅速积累学术资源,构建得以使之立足于高校之内的科学性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另一方面,国家的强势化、社会的实用化和民主化趋向,又要求其具有既满足民族文化工程又满足大众文化和教育需求的政治功能和人文诉求。科学性的学科导向与文学的人文本质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个难以调和的矛盾:科学性的高度理性思维与文学本体的道德、情感、美学等非科学性逻辑之间的矛盾,文学学术的精英追求与大众缔造作品、作品依赖大众而存在的文学本质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的存在,决定了构建之初的美国英语学科之内的两个根本冲突,即以科学论证为主导、以解读为根本的新兴研究方法与以主观评价为己任、以鉴赏为根本的传统批评方法的冲突,学术派与反学术派的冲突。

基于德国语用学背景之上,视文学为语言或历史事实的语用学研究法,因其研究模式的数据化和研究内容的刚性化,成为学术主张的典型代表,不仅为英语文学专业注入了学术元素和科学因子,也确立了英语语言文学学科在高校中的学术地位。但其悖逆于美学批评和价值评判、无视文学作为美学事实、个体事实、文化事实和道德事实而存在的缺陷,也使文学学术陷入理性极端和狭隘视野的窘境之中,为反学术派学者提供了批判文学学术的正当理由。作为态度坚决的反学术派学者,通才教授从维护文学的人文本性出发,拒绝将文学作为科学真理或理性逻辑加以研究,主张文化民主,认为文学学科的

重要任务是通识教育和人文传播而非学理钻研。但是,通才学者的人文视域因与科研视域全无相交之处而逐渐陷于以俗化、简化或趣化方式言说文学的平民境界和生活视角之中,走入与语用学完全对立的极端误区,通才学者也因无以涵纳学术理性,在语用学研究方法终因无视文学本性而陷入颓势之时落入败局。

20世纪初的通才学者既非20世纪初的全新事物,也非传统文人的全面翻版。他们的文学普及活动,外化了英语文学学术化过程中的矛盾与困境,暴露了文学学术与大众文化逐渐疏离的事实。而他们最终与媒体和出版业的结合,又促进了中产文化的形成,演绎了社会转型时期的典型特征。为此,通才学者是将学科推入“混乱与迷惘”局面之中(Graff 105),同时又从反面助推文学学科迅速发展的内部纷争与外部压力的一部分,也是将美国文化引入市场体制之中的市场动力和文化资本的一部分^①。

二、通才学者的文学理念

通才学者的文学活动既广且泛^②。这种广与泛,依鲁宾之见,是通才学者“在变化着的历史语境中迎合各种需要”的结果(Rubin 144),因而也代表着这些需要的广与泛:大众、学生等文学受众的人文需要,媒体、出版业等商业集团的利益需要,以及通才学者履行文学教授之责、获得心灵情感自由、实现自我价值的个人需要等等。如果说文学学术是现代性的全新产物,那么以迎合学术之外的种种现代性需求、以对抗学术为其艺术理念和人文立场之立意之本的通才学者,就必然既与时俱进又因循传统。

通才学者对传统的因循主要体现在其对文学本体的界定、对文学阅读的原生态认识方法之上。对于通才学者而言,文学,以谢尔曼之言,处于“明晰可辨的事实疆界之外”(Sheman 153),因此,文学阅读的功能和目的,既未发现论题也非论证观点,而是修身养性、净化心灵,完善自我(Rubin 155-156)、塑造品格(Rubin 57)、怡情益智、筹备人生(Vanderbilt 9),无需理性引领,只需“内心之光”(Sheman 153)。内在于文学学术的阅读训练和规则套用,从根本上抛弃了文学本源、遮蔽了文学真意,不仅多余,更是误导。正如“成为缜密科学”的“文学研究”对谢尔曼而言“必将因枯竭贫瘠而衰亡”一样(Sheman 153),“弃直感而择实验,弃释读而重发现”的专才学者对坎比而言,也必将在转型为科学家的同时使文学研究转化成“纵横字谜”(Canby 252),转化成“一场追逐自我毁灭之力量、毫无生气可言的竞赛”(Canby 195)。

学术对文学的根本威胁,在通才学者看来,是对文学人性本质和美学特性的无视或扭曲。虽然通才学者将哲学性和美学性的双重内涵置于文学的界定之中,但其文学实践却并不是对文学美学本质的深入探求,不是对文学哲学内涵的积极探索,而是对文学道德教益和素质提升作用的阐发。通才学者认为,文学讲授即文学批评,文

学批评即道德教诲,文学学术对于文学人文本性的弱化因而是对文学道德作用的弱化,对文学学者教师之责的弱化。依此逻辑,文学批评和文学教学是“对有意阅读的美国智者的传道解惑”(Vanderbilt 445),是实现民主之道(Rubin 117),抵御庸俗之法(Rubin 116),也是大学教育平民化转接的媒介。基于此种理解,通才学者多乐于为师,也善于为师,常以亲和、通俗、激发快感和投入情感的方式讲授和言说文学(Graff 86-87),常将文学讲授内容置于日常生活主题和日常道德命题的现世背景之中。

但是,对文学理性内涵近乎毫无折中的批判和摒弃,使通才学者的人文拯救、传统传承以及文化创建陷入道德相对论和一元品位观的误区之中。通才学者普遍将传统等同于品位,厄斯金认为,“无传统,即无品位”,“亦无让品位得以施展其上的东西”(Erskine 56),“传统的缺失如若阻滞了艺术,就会间接造成举止失体,行为不端,因为行为举止实乃艺术”(Erskine 58)。通才学者们对不合其品位标准的思潮一律采取排斥态度,他们反对政治激进主义和纯美学主义,鄙薄自然主义、物质主义和现代主义。在他们眼中,自然主义赤裸而野蛮(Rubin 55),物质主义低级而庸俗,而现代主义则极端和扭曲。坎比就先将先锋派文学逻辑描述为“主体欲望”的发泄(quoted in Rubin 118),认为现代美国文学承载的是“变态、失衡和失度”等内容(Rubin 119)。即便是率先开设现代文学课的珀瑞和菲尔普斯也坚信,与现代文学相比,古典文学才是真正的习养艺术之道,而谙熟此道也只是少数人才具备的能力(Perry 146)。正因为如此,通才学者对名著文化的竭力推崇与积极实践,虽貌似基于大众立场上的文化普及,实为对所谓的文化道德性和品位纯洁性的极端守护。

虽然通才学者在道德与文学视域上偏向保守,但是,他们既不像拒斥文学娱乐作用和快感功能的新人文主义者那样沉醉于古典传统,又不像爱略特等褒扬传统的文学现代派那样憎恶现代文明;既不像美国诗人惠特曼那样对大众充满浪漫与理想,也不像美国哲学家桑塔亚纳那样对大众不屑一顾。从根本上而言,通才学者既现代又传统,既认同于大众又高于大众,高于大众是因为他们与其他沉溺于对社会进行智识性批判的知识分子一样,将其文学普及活动视为精英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对全民素质的拯救;而认同于大众,则因为他们将大众置于自己的视域之中,以通俗方式言说文学。这种大众视野作为他们满足市场需求和接纳商业逻辑的前提和条件,具有了相当的现代性。但是,通才学者最为显著的大众化、现代化特征是他们对个性张扬、自我表达的竭力追求。通才学者,如鲁宾所言,多为渴望表达情感、企盼宣泄自我、向往个性自由的率性至情之人(Rubin 159),他们的教学、创作与著述均是情之所钟,是对心灵需要和情感需求的满足,是个人情感、个人思想以及个人体验的行为化再创造(Rubin 56, 159),因此他们反叛学术的初衷之中也包

含有坚守个性和维护自由的动机。职业与公共行为中的个性动机使通才学者具有传统内涵的文学行为成为美国文化由品格文化向个性文化转型的现代表征与产物^⑥。

如果说个性因素仅仅指涉了通才学者现代性的一个方面,那么通才学者对商业和市场的包容与利用,就将文化的商业化与市场化存在这一现代特征,演绎得淋漓尽致。通才学者在走入市场、满足学术以外的种种需求时,其前期文学理念的道德和文学纯粹性逐渐失落于其后期文学活动的商业性、新闻性与广告性之中,其前期的美学选择也逐渐沾染了商业动机。后期的谢尔曼对文学评论的一番表述足以说明通才学者的变化之巨,谢尔曼认为,文学评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印象式感言,而是要“省略括弧,去掉从句,减少从属表述……减少典故;抹去暗喻;语句不得缓和;记住你是在做广告—你是‘布告牌’,而不是‘蚀刻画’”(Rubin 66)。

三、通才学者与大众阅读消费

可以认为,通才学者人文实践无纵深拓展,其文化传播无理论诉求、其民主追求无草根根基等种种缺陷,赋予了其大众性和现代性以较强的商业可塑性和市场易感性,这一缺陷会同逐渐垄断非学术文化领域的市场体制、逐渐弱化公共职能的学术文化一起,决定了通才学者必然与媒体、出版业和报刊业形成同构共生的利益关系。对于疏离学术的通才学者而言,市场是实现自我、实践理念最为有效最为广大的空间与平台,而对于必须依赖大众而获得利益回报的媒体、报刊业和出版业而言,通才学者的公众性、亲和力就是开发大众市场的象征性资本,通才学者的身份及权威就是吸引顾客的象征性广告。因此,通才学者介入市场,既是商业对其的主动选择,也是其自身对市场半推半就的迎合。他们介入市场的结果是,一方面将人文气息引入了市场,使文化商品具有了人文内涵,使公共领域拥有了人文传输渠道,另一方面其自身在趋同于市场逻辑的同时沦为商业集团的利益工具,而其文学言说在一定程度上变异为新闻传播与商品广告。在语言和思想上展现出市场潜力的谢尔曼被《纽约先驱论坛报》副刊《读书》聘为位于头版的文学专栏主持者时,就起到了这种双重作用。该报将谢尔曼之名置于报纸名下,并配以“最为权威、享誉国内外的文学诠释者”等文字说明(Rubin 67),借宣传谢尔曼而推销了自身。

通才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被信息化、广告化了的文学言说,如鲁宾所说,在协助媒体与出版社不断将大众的文化焦虑转化成对文化商品消费的焦虑,将对知识的焦虑转化成对文化信息的焦虑的同时,也协助两者以商品形式不断解除和再制造焦虑,将文学转化为消费品,将文学阅读与文化习养转化为消费行为、时尚追随和信息获取。但是,通才学者的行为的确使大众阅读意识逐渐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协助解决了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文化盲和素质劣问题,填补了学术无以也无意填补的文化

空白,使阅读得以变成实现民主和代言民主的重要渠道,成为民主意义的象征性载体。正因为意识到商品形式所具有的这种文化功能,通才学者的商业介入逐渐由他者主导转为主体主导,其对文化的商业运作方式也逐渐由认可趋于认同。坎比在承认自己的工具作用的同时,就坚信其与“读书俱乐部”的商业化合作是教育对新时代做出的正确反应(Rubin 121)。

厄斯金对广告的了解与推崇,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鲁宾关于厄斯金名著课程操作方法实乃典型的广告运作法之观点的正确性。鲁宾认为,厄斯金有效利用明星教授身份,巧妙创造亲善使者形象,自觉弱化识读、辨析、批判能力的培养,刻意突出经典作品的可及性、可读性和可对话性,并以名著榜单和名著概要替代文学和文化整体,其名著课程虽无商业介入,却演绎了商业运作的高妙之处(Rubin 174-175)。厄斯金名著课程开设于经典出版所引发的经典热潮之中的事实,从侧面说明了商业在其经典传播过程中的有效作用。1910年,科利尔父子出版公司(P. F. Collier & Son)就以哈佛经典系列之名出版了哈佛校长查尔斯·爱略特的“五尺书架”经典书目,将爱略特之语和哈佛之名作为营销热点,成功制造了一场经典消费热潮。“人人图书馆”(1906年)、“现代图书馆”(1925年)等经典系列的出版,都是这一时期经典热潮的典型表现。厄斯金的名著课程既充分得益于已被出版业调动起来的文化焦虑,也充分利用了被出版业赋予经典书目的商业张力。这样的焦虑与张力,在圣约翰学院因采用本科全程经典教学大纲而一举摆脱入学率低以及经费不足等困境这一事实中(Rubin 189)可见一斑。1952年,艾德勒的经典书目,在称艾德勒为“美国头号促销员”(Rubin 195)的参议员William Benton的提议下,以《西方世界的经典名著》(*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之名由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推出,该系列最为独到之处并非入选的经典著作本身,而是艾德勒编辑的包含有100个思想主旨的两卷本《西方大观念》了。经典书目的制定以及经典思想的圈定,既体现了通才行为以信息代文学、以标准代思想、以规则代文化、以简述代评论的反文学特征和反文学手段,体现了精英文化平民化转接通道的简约化程度和商品化性质,也无可否认地体现了通才学者使美国与西方有了一体性,使美国大众在文化层面有了凝合点,展示了通才学者在大众层面强化西方文化自信、培养西方文化自觉、深化西方民族精神等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四、通才学者与文学学术界

尽管信息性、标准性、体系性使通才学者的经典传播与专才学者的学术行为一样包含了现代思维特有的工具理性成分和技术性体系化逻辑因素,但通才学者对貌似对立的矛盾体如精英与大众、传统与商业、教益与娱乐、精神与物质、知识与消费、知识与信息、文化与个性、理想

与现实、公共与个人等的涵纳与折中,使其行为既迥异于学术文化,又区别于大众文化,被归于吉勒瑞所说的“高雅文化的大众化形式”这一中产文化的畛域之中(Guillory 87)。中产文化尽管非此非彼,但如吉勒瑞所说,至今仍是解决“美国[即低俗或大众文化]与西方高雅文化关系”的一种途径,而且极有可能是目前唯一的解决方式,因为“西方传统名著今天没有也从没有以超越中产文化形式的方式被融合进大学校园之外的美国文化生活之中”(84)。的确,中产文化可能并非阿多诺和霍克海姆所说的具有蒙蔽民众之实的文化启蒙,但是,相较于专才知识分子以高度理性和高端智识改造社会的责任定位,通才学者的中产文化活动,显然具有对大众浅层阅读要求过分纵容、对大众阅读过度助读的偏差。这一偏差使通才学者的文学言说欠缺对大众理性反思能力和批判意识的调动,欠缺沟通大众阅读与社会改良的社会构想,欠缺对叙事空间、历史氛围或政治因素的探索,较少以传统经典视角展开对现实的深刻反思,因而也较少使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评论进入相互关照与反视的境界,更少对传统的地位与意义做出全新的阐释。通才学者的文化行为,在视智识能力为论辩、反思、分析、批评、评价以及建构思想和置疑思想之能力的学术界—无论是早些时候的保守专才还是当今的激进学派—看来,对美学精神构建既无理论贡献也无行为参与、对社会思想意识现状既无颠覆作用也无建设意义。即便是同被格拉夫界定为通才学者、对语用学亦持坚决批判态度的白璧德也贬称其他通才学者为“不务正业者”,斥其为“自然主义运动的女性化表征”(115),专注于“日常主题”、“巧言妙谈”、“取悦逗乐”(116-119)。在专才学者眼中,通才学者轻慢“出科研成果”这一“学术”正业(Sherman 149),不过是“文字商人”(Krupnick 237)或教书匠而已。为此,谢尔曼感言,“要在学术领域获得升迁就不能在学生身上浪费时间,而是要出版”(Sherman 149),菲尔普斯也叹道,“受学生欢迎已成[升职之]障碍”(Pheps 164)。

早在20世纪初,如白璧德所说,美国“全国较为重要的古典和现代文学系主任职位已大多为受过科学训练、具有科学成就的人所占据”(Babbitt 116),在此无以逆转的学术大潮下,通才学者与学术的对抗终以无可挽回的败势而告终,通才学者作为一个并无组织性和凝聚力的群体在20世纪30年代也逐渐解体,年长的通才学者接连逝去或退休,新生代通才学者要么成为文学新闻从业者,要么被新批评所同化,要么完全放弃了通才道德与社会观,皈依于专才学术理念(Graff 147)。

五、通专之争的当代反思

通才学者从学术领域的最终退却,意味着学术思维和科学逻辑对高等文学教育的全面同化,意味着学术体制与趋从于大众层面的思维习惯、助益于大众阅读的人文功能、活动于公共领域的文人行为的逐渐疏离,将文化

的精英性、学术的精英地位以及文学的学科合理性保有在学术同质性之中的内在动机。但是,通才学者在学术领域的边缘化,并不等于其所代表的人文理念已经消亡,也并不说明文学以大众为存在根基与存在前提这一根本特性的消亡。格拉夫认为,通才学者反抗学术的积极意义,在于这一行为促使文学学术界加强了危机意识,生成了反思自身的能力,迅速建构了学术体系,从结果上推进而非阻滞了文学学术的发展(Graff97)。事实上,通才现象的当代意义并不局限于其对文学学术的反抗与挑战这一行为本身,不局限于这一行为所产生的直接后果之上,而是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通才学者所代表的一部分人文理念仍然以各种方式和形式存在于美国的高校内外。首先,高校之内,内在于通才理念的人文思想被诸如新保守派之类的文学学者如 Walter Jackson Bate, E. D. Hirsch, 哈罗德·布鲁姆等部分传承下来,这些学者尽管不再以通为业,但仍像当年的通才学者一样制定经典书单,疾呼文化普及,呼唤文学回归人文,以其登上畅销书榜单甚至榜首的人文著述广为中产人士所知晓。与此同时,不少大学仍以名著为通识教育内容,圣约翰学院和 Thomas Aquinas 学院仍采用名著大纲为本科教学大纲。而高校之外,“名著基金会”一直致力于推动经典传播和阅读,在全美各地组织形式各异的名著讨论。经典出版在基金会等组织与政府的支持下仍是出版界热衷之事。1990年,《西方世界的经典名著》就在艾德勒的修订与扩展下,重出新版。而与此同时,系列经典导读书至今畅销不衰,导读网站也大有异军突起之势。

其二,曾被通才学者所外化的学界内部分歧和内外矛盾并未因文学学术的发展而有所消减、变质或转移。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教学与科研、价值观教育与职业化教育、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学生大众与学者精英、学者师德与专业发展、文化传统与现代大学等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市场化、民主化态势与学术化、专业化态势的并存,因美国学术精英主义和大众反智主义的对抗,而无从消弭,文学的美学、情感、道德等逻辑与先行假设再行论证的科学思维之间的矛盾,因文学学术日趋理性、规范与数据化,更是无从消解。人文学界内部的理论争议,多数都是围绕着这些矛盾而展开的,学界内部的理论探讨,也多数是以趋同于矛盾一方的视角而进行的,尽管这种理论探讨亦表明学界以职业为主导的争鸣已转化为以思想为主导的争鸣。Dwight Macdonald 等学者将中产文化视为穿着儒雅外衣却无以吸纳儒雅文化智识思维、创新性思想的大众文化,生产文化商品的产业文化,相较于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更具侵害性的文化模式。Russell Jacoby 等学者,则将具有公众意识美德的知识分子的消亡,归咎于学术对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在内的智识文化行为的垄断,归咎于学术智识文化对公众文化服务功能的丧失^④。新保守派更是将人文教育的颓败以及由此所导

致的文化愚昧现象归因于文学研究的极端学术化、理论化和意识形态化思维现状。与此同时,左派人文学者的意识形态化文学批评,将以经典价值与传统道德为核心的人文思想视为霸权意识之体现,而其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审视,对民主目标的诠释与追求,则是在展示优越于大众化思维的精英智识能力的行为中,标榜对大众的拯救。

其三,通才现象的更高层次意义,则在于其应引发人文学者在思考矛盾冲突现象的同时,关注生成于同一语境的学术与学术外文化在貌似绝对的矛盾状态下的趋同化现象。如果说学术理念与通才学者所代言的人文理念之间的矛盾,因既反映了学术界对理性思维的崇信又体现了其对道德信念、师德师风等的摒弃,而同时具有了得与失的话,那么美国当代学术界的理性优势,也在学术运作与学术存在模式普遍重复通才学者商品化、广告化和新闻化弊端、摒弃通才学者长处这一双重行为中逐渐失落。如今,关注学界研究动向与新闻要事,是美国学者个人职业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研究的成功往往取决于其是否迎合研究潮流,对研究潮流是否有创新性视角的贡献。而学术探求又常常潜行于批评著述所构成的不断更新的庞大知识体系与信息体系之中,而非文学作品本身,即便是文学作品本身所构成的典律对于文学学术而言也仅仅是数据与信息。学术话语与著述方式,因是信息累积、命题寻找、规则套用以及命题论证,对文学意义也成为对规律与规则地发现。与此同时,学术成果,不仅依赖圈内的广告式运作,也成为换得生存权利与声名地位的商品。学术成果的量化也使数量成为学术个人和学术整体发展与进步的标志,从而使学术在某种程度上唯“量”是图,唯“用”是图,进而唯利是图。文学学术的信息化、商业化、市场化和产业化,不仅造就了沙姆威和坎贝尔等人所说的学院明星制与追星族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学术道德建立在职业利益基础之上,使学科之内的竞争和危机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肇始于政治、资金等原因,产生于以利益为指针的大企业竞争模式之中,而不是改良社会的思想与思辨语境之中,不是教益学生、授业立德的需要之中。尽管文学学术也无可否认地在这一模式中通过理性探索和理性思辨将文学探讨保持在思想活跃、挑战现状、纠正偏见、洞见真相、不断出新的进取状态之中,但文学学术的道德立场也毕竟无可否认地陷入忧患。

也许正是对这种兼具排斥性的同质现象的普遍回避,美国英语文学学界内部相互批判、相互制约的良性作用才无以减缓人文派与职业派、新保守派与左派、学术文化与中产文化的尖锐对立。21世纪的美国大学,如果确如詹姆斯·杜德斯达在《二十一世纪的大学》中所说,正在演变成富于竞争、被市场完全同化的企业化产业和社会服务业,那么,由通才学者的出现以及通才理念的存在所引发的思考,就应该超越其失败或边缘化的事实本身,

超越对专才和通才进行高下之分的学术视域,进入学术文化与中产文化既对立又同质、既互斥又互补的矛盾关系之中,关注如何使两者取长补短、互惠互益,关注如何使两者的同质性超越物质范畴,进入良性精神层面,关注如何使知识分子和作家既有平民立场但又具有超越平民的独特性和个体性,关注如何使文化知识的传输与理性批判意识的培养衔接而行,使学术研究与施教弘德并行而进,使美学逻辑与理性逻辑互相兼容。

对美国 20 世纪初的通才学者现象似亡尤存的最终结果的思考,在同样是貌似学界异端、其中却有学界之变和社会之变之丰富征象的易中天现象在中国初起之时,在易中天等明星学者被学界非议但被各自所在学校奉为广告资本之时,对中国人文教育、人文研究以及民族文化意识构建扬美国之长避美国之短尤其是必要。

注解【Notes】

① 通才学者的相关史实,如未特别标注出处,均源自 Biography Resource Center /Literary Resource Center Farnington Hills Michigan Thomson Gate, 2007. May-June 2007. <http://galenet.galegroup.com/servlet/BiRC?locID=xnu>; <http://galenet.galegroup.com/servlet/LiRC?locID=xnu> 等。

② 详见 Rubin.

③ 关于这一转型参见美国历史学家 Warren I. Susman 的论著 *Culture as Histo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④ 见 Dwight Macdonald 的“大众崇拜与中产崇拜” [“Masscult and Midcult II” *Partisan Review* 27.4 (1960): 589-631]。见 Russell Jacoby 的《最后的知识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dmi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abbitt Irving “From 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 Essays

- in *Defense of the Humanities*” Graff and Warner 111-120.
- Campbell Colin “The Tyranny of the Yale Critic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9 (Feb. 1986): 48.
- Canby, Henry Seidel *American Man of Letter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7.
- 詹姆斯·杜德斯达 (James J. Duderstadt): 《21世纪的大学》(*A University for the 21st Century*), 刘彤 屈书杰 刘向荣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 Erskine, John. *Democracy and Ideals*.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mpany, 1920.
- Graff Gerald *Professing Literature: An Institutional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Graff Gerald, and Michael Warner, eds. *The Origin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 Guillory, John “The Ordeal of Middlebrow Culture” *Transition* 67 (1995): 82-92.
- Krupnick, Mark “Middlebrowism in the American Academy” *American Quarterly* 40.2 (1988): 229-239.
- Perry, Bliss “From And Gladly Teach” Graff and Warner 136-46.
- Phephs William Lyon. “From Autobiography with Letters” Graff and Warner 156-67.
- Rubin, Joan Shelley. *The Making of Middlebrow Culture*.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2.
- Sheman, Stuart P. “Professor Kittredge and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Graff and Warner 147-55.
- Shumway, David R. “The Star System in Literary Studies” *PMLA* 112.1 (1997): 85-100.
- Vanderbilt, Kermit.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Academ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6.

责任编辑: 陈富瑞